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春福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

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7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阮春福,祝贺他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传统情谊深厚,共同利益广泛。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双方坚守共同理想信念,践行团结友好初心,以实际行动赋予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越共十三大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越两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步入承前启后关键阶段。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越南领导同志一道努力,加强对新时期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朝着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断迈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表示愿同范明政总理一道努力,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夯实友好合作基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构建互利共赢格局,推动新时期中越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政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表示愿同范明政总理一道努力,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夯实友好合作基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构建互利共赢格局,推动新时期中越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从造出第一块国产手表,到有实力进军世界高端技术领域,中国手表工业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引以为傲的标记——

追赶时间,“海鸥”展翅翱翔

本报记者 杨子岩 谭涵文



国产手表在设计、制造方面不断创新,产品越来越丰富。 海外网 李昆亮制图

周末,82岁的天津海鸥表业集团退休职工那秦生又去海鸥表博物馆转了几圈,这已成为他回厂时的“例行动作”。从18岁进厂,到72岁结束返聘、正式退休,那秦生在手表厂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那一块块海鸥表承载的岁月里,有他的青春,还有新中国手表工业发展的记忆。

那秦生说:“新中国刚成立时,摆在天津亨得利、美华利、九华等表店柜台上的全是洋表,我们有会修表的能工巧匠,但制表工业是个空白。”

1954年4月20日,以美华利为首的几家表店率先联手,研制出不带宝石钻、全部不依赖进口部件的“国华”牌手表,其他表店的工人有些坐不住了。

“我们要制造手表!” 怡威表店师傅张书文喊出了工人们的心声。当时天津一大批修表工匠集中在两家公私合营的钟表厂,一家是生产“象球”牌木钟的华北造钟厂,另一家是生产“金鸡”牌闹钟的华威钟表厂。张书文找到华威厂的公方代表杨可能,经过反复沟通,1954年底,天津市轻工业局批准成立手表试制组。

试制组有4位师傅,除张书文外,其他3人江正银、孙文俊、王慈民来自华北和华威这两家厂。杨可能腾出自己的办公室作为“车间”,试制组在简陋的平房里开工了。没有造表经验,张书文他们就拆解一块进口15钻粗机手表,天天琢磨它;缺少制造设备,他们就把各表行里的国外设备七拼八凑搬到“车间”。在这种条件下,要制作出比纸还薄、比针还细的精密部件,还要保证各部件之间配合得天衣无缝。几位师傅用简陋的设备打磨毛坯,戴着放大镜做绣花般的精细活儿。

那秦生告诉记者:“听江正银师傅讲,1955年3月24日,第一块咔嗒作响的手表走起来了!试制组高兴极了,起个什么名字呢?大伙想到了国旗,就在表盘上用4个小五星托起了1个大五星,下面印上‘中国制造’,起名五星表。”

“第一只‘五星表’的制成,不仅结束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更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表工业迎来了崭新的开端。”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刘翔说。

第一块国产手表制造成功,极大鼓舞了试制组,他们又赶在当年“五一”前夕制出5块15钻大三针手表,向国际劳动节献礼,并正式定名为“五星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得知消息后,指示天津要扶持这个产业。1957年,试制组扩大,正式挂牌成立天津市手表厂筹备处,即天津手表厂的前身。

1957年4月23日,筹备处生产的第一批手表正式出厂,标志着中国第一批产品化手表问世。同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发消息《“五一”牌手表出厂》,文中写道:“这批手表的零件中,除卡子、卡轮、摆轮、油丝、钻石等是进口货以外,都是国内制造。”

从那以后,中国手表工业的多个“第一”诞生在这里:第一块自主设计机芯手表“东风表”,第一块计时码表、第一块出口手表“海鸥表”,第一块符合国际标准的女表……2005年以来,“海鸥”不仅陆续攻克了世界钟表业三大复杂工艺——陀飞轮、万年历、三问,还在2010年研制成功集合陀、万、问的超复杂腕表,价值百万元人民币,标志着中国手表工业已具备进军世界高端技术领域的实力。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钢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2008年4月,海鸥参加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一家外国公司竟投诉参展的“双陀飞轮表”关键部位抄袭了他们的专利设计,限时让海鸥提供证据,否则将面临“当即清场,来年不准许参展”等处罚。“经过瑞士专家严格鉴定,我们的设计不存在侵权。”王钢说,这场胜利,不仅使海鸥一鸣惊人,也让“中国制造”再度引以为傲——中国手表工业完成了由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升级。在今年5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无论是时尚的国产智能穿戴手表,还是体现东方美学的国潮系列腕表,以及国产高端机械手表,都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

海鸥表博物馆内有一面“机芯墙”,200多块机芯全部是中国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远销海外。“海鸥一路追赶时间,展翅翱翔,集团正在打造民族品牌中国芯。”王钢说,“想在手表制造这个领域卡我们脖子,不可能了!”



扫码观看视频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是毫无底线的恶行

■ 李嘉宝

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中方通过翔实数据和具体案例,有力驳斥了美西方炮制的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谣言,再次向国际社会阐明立场:支持科学开展病毒溯源,反对将溯源政治化。

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的一贯主张。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率先同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病毒溯源研究合作。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由世卫组织独立挑选的17名国际专家来华,同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为期28天的实地研究。3月30日,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发布,明确得出“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并提出在全球更广泛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等建议。作为全球溯源研究的中国部分,这份报告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其客观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理应作为下一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维护。

然而,世卫组织日前发布关于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计划,把所谓“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露”这一假设为研究重点,这显然站不住脚。一是与科学事实严重不符。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无一一人感染新冠病毒,该所未开展过冠状病毒病毒功能研究,更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无关”的看法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共识,24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日前在权威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强调这一点。二是与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严重不符,是对联合专家组工作成果的极不尊重。对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内容再重复开展研究,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拖慢全球病毒溯源进程,损害世卫组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所谓“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的荒唐说法,正是美西方反华政客和一些媒体反复鼓噪的。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全然无视事实和科学,“拿着结论找证据”,大搞“有罪推定”,到处煽风点火,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攻击和抹黑中国,向世卫组织施压。不久前,美国纠集少数西方国家质疑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敦促”已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的中国接受“国际调查”。与此相呼应,美国某些政客公然站在科学对立面,指使其情报机构搞所谓“情报溯源”。美西方还肆意打压、威胁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的专家学者。可见,所谓“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就是美西方政治操演的产物,是毫无底线地在搞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

需要警惕的是,高喊“透明”“迅速”“科学”的美国,却始终对本国新冠疫情的诸多疑点装聋作哑。这种双标行为,充分暴露美方试图推卸自身抗疫失败责任、为打压遏制中国发展而拼命寻找借口的政治算计。时至今日,美国从

未向世卫组织发出溯源邀请;针对美国早期新冠肺炎病例可能早于已知时间的报道和报告,美方一直不回应;对于国际社会针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在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严重关切,美方始终三缄其口。作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死亡病例最多、疫情疑点最多、早期感染病例的时间线还在提前、“病毒起源疑团”,美国难道不应该是下一阶段全球病毒溯源的重点吗?

病毒溯源旨在弄清病毒源头及传播机制,帮助人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而不是成为政治操演的工具。随着多国陆续发现早期新冠肺炎病例,在全球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的必要性不断凸显。日前,多国政要和专家均明确表示对病毒溯源政治化说“不”,迄今已有近6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病毒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政治化。人们希望世卫组织切实秉持科学精神,摆脱政治干扰,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在全球多地进行科学溯源,维护好全球抗疫合作的氛围。这是国际社会对世卫组织的殷切期待,也是世卫组织的职责所在。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专栏主持人: 陈振凯

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

黄文秀的追求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正是给砂糖橘树疏枝的时节。走进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不少村民都在果园里忙碌。村里的人说,“这是黄文秀书记带领我们种下的致富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29位功勋模范党员获“七一勋章”,黄文秀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她无法到场,因为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9年夏天。

黄文秀,1989年出生于广西壮族百色市。2016年,研究生毕业的她,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成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

2018年3月,黄文秀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石山林立的百坭村曾是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中曾一度有195户贫困户。黄文秀驻村时,全村尚有103户没有脱贫。

驻村后,黄文秀收起了漂亮的裙子,穿上运动服在山野村屯间奔忙。她逐一走访全村贫困户,绘制了“贫困户分布图”,每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她都一一标注在笔记本里。

村民口中的这个“女娃”,让村子变了样。她帮黄仕京的孩子申请了助学的“雨露计划”;给黄邦旋争取到产业奖补资金种水果;因地制宜发展杉木、砂糖橘、八角、枇杷等特色产业……2018年,百坭村8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下降到2.71%。

2019年夏,黄文秀利用周末时间,赶回家看望刚做了肝癌手术的父亲。6月16日晚,黄文秀准备动身返回百坭村,病床上的父亲劝她:“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去吧?”

“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面对父亲的挽留,黄文秀叮嘱了一句“按时吃药”,便即刻出发。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她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一路上,她不断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联系,询问当地雨势和灾情,特别叮嘱要关注几个重点村屯,组织群众防灾救灾。

6月17日凌晨,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从百色市通往乐业县的山路被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没,黄文秀不幸遇难,年仅30岁。

黄文秀的身影永远留在了扶贫路上。